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与检察应对——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

吴悠¹, 褚韵^{1,*}

(1.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030; *通讯作者, yun_chu@163.com)

摘要: 轻罪治理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 而随着近年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断卡行动”等力度持续强化,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典型的“轻刑犯罪”, 在司法环节的适用被充分激活。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归纳即检察实务分析, 挖掘当前案件办理的特征及审查难点, 建议通过准确审查案件、优化办案模式、加强听证参与以及推进大数据手段参与社会治理等方式, 促使以此类案件为代表的网络轻罪案件司法处置及治理策略更趋合理完善。

关键词: 轻罪治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刑事检察; 社会治理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强调“推进多层次领域依法治理, 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近年来, 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最高检有关数据显示,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不到55%上升至2022年的超过85%, 轻微犯罪及轻刑率的上升反映出新时代犯罪形态的显著变化, 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上升[1]。

轻罪较低的犯罪门槛和较高的犯罪数量对检察机关的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高检在《2023-2027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强调, 研究轻微刑事案件出罪入罪标准, 促进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相较于轻伤害、小额盗窃、交通肇事等相对传统的轻罪案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 在司法环节的适用被充分激活, 从起诉人数总量及占比来看, 已然成为公民涉刑的高频罪名。但理论界对本罪的刑法地位、行为性质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始终争议不断, 实务中则存在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模糊、客观行为表现多样难以确认、入罪判罚门槛标准波动等诸多问题。

面对犯罪结构轻罪化的长期趋势, 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内涵有新期待, 需要重视和加强轻罪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探索。作为在刑事诉讼中全程参与、承上启下, 其职能发挥直接影响刑事诉讼功能实现效果的检察机关, 不仅仅需要通过提前介入和行刑衔接等职能, 识别案件是否有必要纳入刑事司法范畴, 也需要通过发挥起诉裁量制度, 在司法审判的终局裁量前, 把控对违法行为人的追诉方式, 包括考虑对其人身自由等基础权利是否设限等, 包括在司法裁决确定后, 如何进一步完善类案系统治理等等, 将对个案的惩治作用延伸到犯罪风险管控和预警机制的建设。通过对帮信案件的办理现状进行检视, 分析其作为网络时代新增轻罪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开展治理应对时面临的瓶颈, 推动解决检察实践堵点、难点问题, 结合检察实践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既是精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需求, 也是通过完善参与轻罪治理的检察职能构建, 回应人民群众新时代法治新需求, 为公民行为提供明确规范指引的客观要求, 进而有助于真正推动轻罪治理落地, 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1 “轻罪时代”的概念解析与特征

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和研究习惯, 近年来一般以宣告“3年有期徒刑(以下)”作为划分轻罪的标准。在司法实践层面, 犯罪结构的轻罪化本身也是积极治理的成果, 包括在犯罪治理领域的长期奋战、刑事立法的有序“扩张性”应对, 以及司法系统自身的主动作为等。最高检的工作报告等相关数据显示, 严重暴力犯罪和重刑

率双双下降。如起诉的严重暴力犯罪从1999年的16.2万人，降至2019年的6万人[2]，而轻微刑事犯罪和轻刑率则明显提升。以G市为例，2022年至2024年的三年间，轻刑案件的占比已超过85%；其中新型犯罪和与经济、社会管理秩序密切相关的犯罪增长迅猛。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轻罪案件与具有突发、偶发特征的重罪案件相比，其背后社会、经济等机制体制方面的问题更为复杂，甚至社会公众认知上也可能发生误区。仅以司法审判通过程序上的“从严惩处”来应对这些轻微犯罪或违法行为，并不足以让刑罚发挥提升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安全感的效果。对轻微违法行为“一网打尽”不仅可能付出过高的司法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扼杀自由活力。在案件“平均危害程度”（借助统计学的“人均”概念）下降的背景下，需要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的落实，来推进刑罚（制裁）体系的轻缓化、多元化，同时实现快慢分道，提高司法效率，有效控制轻罪在定罪刑罚中的“溢出”（泛化）效应。

因此，检察办案与监督工作需要适应犯罪治理需求的变革而调整。要对犯罪进行分类区分治理，认识到轻罪治理中司法职权运用的特殊性，以往必须通过侦查、起诉再到审判才进一步促使行为人认罪服法的过程，客观上受到认罪认罚等司法制度的影响，程序上往往有所简化。而仅仅依赖于刑事审判来开展刑事治理，也难以延展到社会治理的成效，并深层次指向需要开展监督的管理薄弱环节。特别是在网络空间迅猛发展的当下，需要应对“新质生产力”等社会创新发展需求和传统行为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包括对具体行为在民事侵权、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范和触犯刑律之间，进一步明确标准界定，从而为公民行为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的保障。

2 轻罪视角下帮信罪的“治罪”理论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刑法修正案出台等影响，轻罪治理研究热度逐步升温。由于起步较早，域外的研究颇具参考意义，包括对犯罪分类标准的细分（如美国一般以重罪、轻罪和微罪作区分），轻罪案件对效率价值和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视，包括由此产生的诉讼程序简化（辩诉交易）和量刑调整，以及刑事责任承担的“非监禁性”（英国的假释制度）和“社会化”（英美社区服务、社会服务令）等特点[3]。而德日等国家则更注重在实体法上先行进行区分和调整，如日本制定了专门的《轻犯罪法》，并且德日均赋予了检察官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强化了如免于起诉制度、检察官中止诉讼等制度[4]，检察机关由此在参与轻罪治理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我国检察实务界对轻罪治理的讨论集中在办案类型的转变及检察应对方面，但现有的分析集中在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等相对传统的办理罪名，这也给如何融合数字时代网络犯罪的发展态势和相关轻罪治理之间的关联性分析留下亟待研究的空间。

而在帮信罪方面，相关研究的重要发端系学者张明楷在2016年针对本罪不应作为“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论述[5]，从2017年起热度持续增长，从词频分析来看，对司法适用、支付结算方式（影响犯罪构成的认定），以及以判决书为代表的实证分析等内容广泛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在2019年《新型网络犯罪解释》及2020年“断卡”行动开展以后，本罪适用空间迅速扩张，实务界对帮信罪的主观明知的界定、上游犯罪的程度、情节严重的标准和与其他罪名的区分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在推进本罪的治理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通过会议纪要等形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限定。但由于基层案件的不断衍生发展，目前围绕资金混同、流水累计、虚拟货币以及罪名区分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讨论的空间。

3 帮信罪案件办理的检察履职新挑战

3.1 行为认定识别困难

相关数据显示，针对帮信罪案件，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比例较低，主要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如外来人员多、无固定居所及职业等）相关。而较高的证据不足不捕比例，虽然表明检察机关较好发挥了证据识别及案件筛查的主导作用，但也反映出侦、检两家对罪与非罪往往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重点反映在如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诈骗是否存在，以及犯罪嫌疑人出借银行卡的目的及对上游（是否存在）犯罪的认知均无法判断等。

上述情况，主要是源于司法实践特别是侦查活动中存在将这一“兜底性”罪名“前置化”的倾向。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去中心化”趋势不断增加，参与者通常“各管一段”，分工明确，侦查活动难以在同一时段对整个犯罪利益链条全部查明，司法惩治又具有对法条“概括性适用”的倾向，而帮信罪针对的恰是犯罪末端的帮助行为，且由于判罚相对较轻，办案人员易产生“错觉”，认为只要是能够查到出借、贩卖银行卡的行为，就一概可以认定涉嫌犯罪并作为提请批捕的理由。而如果检察机关没有准确识别这种办案倾向，不仅可能导致侦查的消极和指控的无力，同时也使得罪名适用“滥化”，甚至是以“轻罪”的认定来规避对真实“重罪”的查处。

3.2 处置倾向存在差异

作为典型的轻罪且适用认罪认罚比例较高的案件，如果在捕、诉环节，主动适用非羁押措施，本罪的“轻缓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得以呈现的。但非羁押措施能够有效适用，也有赖于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有效监管和保障，以避免发生不到案甚至再次犯罪的情况。网络犯罪中异地犯罪比例较高，其中无业、非本地流动人员居高不下，即便是无逮捕必要或有条件适用缓刑，客观上弃保脱逃、违反缓刑有关规定的可能性较高，也导致本地办案人员可能会遵循“经验主义”，来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担”不捕、不诉和轻缓刑的“风险”。

从实务来看，流动人口综合治理信息化技术手段（例如“非羁押码”、“电子手铐”等）更为完善，同时司法评价管理更为有效的地区，检察人员主导降低轻罪中的羁押比例（包括诉前羁押与判后实刑）的动机可能更强烈，效果也更明显。但地区间司法处置相对“不均衡”的现象，本身就有违司法公平适用的核心原则，甚至可能导致“犯罪地选择”情形，以及遭致社会舆论压力，使得公众错误地理解“羁押”的价值，有违人权保障的初衷。

3.3 综合治理成效未显

应当说，检察机关在帮信案件办理中呈现的特点，并非等同于司法治理的“弊病”，它也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对于网络犯罪治理的强力介入，促使民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司法威慑力，规避风险行为。但回归到本罪在立法中所明确的犯罪客体和治理目标，从“罪责罚相适应”的视角，面对其适用中的飞速增长，同时考虑到被告人累犯比例、平均年龄、文化程度“三低”的特点，检察机关所提供的处置方案应当更多元化。如果仅因属于“轻罪”就“一诉了之”并一概科以实刑，其后果不光是“有尽头的刑期”，还会产生长期甚至伴随一生的“犯罪标签”乃至交叉感染，也不利于轻罪行为人的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

积极推进不起诉和建议缓刑适用，是正确认识“轻罪不是无罪、更不是无害，可依法轻处但决不放纵”的体现。相对不起诉也不代表犯罪嫌疑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而仍需处以对应的行政处罚，并在社会管理措施等方面及时跟进。但现实是，这种处置方式在后续跟踪处理仍有颇多不足，既有检察人员参与“诉源治理”和落实法律监督意识不强等主观影响，也有客观上信息沟通机制不畅、各方在个案处理上存在履职分歧或“盲点”等因素。而针对缓刑适用，也面临着存在执行交接滞后，报告流于形式，监管难以落实等问题，甚至因社会环境对缓刑的片面认知，容易引发舆情。考虑前述的涉案人员身份特征，多数人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并不充分，规制风险较大。在法定条件缺乏明确指引的背景下，往往导致了司法人员在适用“相对不起诉”和“轻罪缓刑”上的“束手束脚”。

近年来，检察机关持续推动“行刑双向衔接”工作，其中加强行刑反向衔接是贯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关键所在。帮信罪之所以入刑并逐渐广泛适用，很重要的一点是此类行为对信息网络犯罪的事实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对上游诈骗等犯罪的既遂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对其通过反向衔接实现轻罪行为“免刑不免罚”，对于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行刑反向衔接的法律规定和制度规范较为概括，缺乏细则指引，如何针对性地开展有效的处罚是难题。例如，2024年11月，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该办法中明确的“惩戒对象”除了“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还包括经公安机关认定的其他对象，实质内容与相对不起诉对象存在重合，但从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实践中尚未见有明确的适用情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在跟进落实方面没有明确的程序保障，行刑反向衔接总体处于比较松散的状况，相关实践效能还不显著。

4 检察机关参与轻罪治理履职优化路径——以帮信罪案件办理为切入

对于负有刑事诉讼主导责任的检察机关而言，面对网络犯罪的扩张性趋势，亟需在“法的积极应对”与“人的行为后果预期”之间寻找平衡。犯罪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防控帮信犯罪需要综合施策，构建多方联动的治理模式，准确认定犯罪类型，严格羁押措施运用，依托检察“大数据”建设，积极应对犯罪治理新挑战，更有效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和威慑功能。

4.1 强化沟通联络，准确审查评价案件

从司法决策角度，作为刑事司法的主导机关，检察机关需要依法科学划定构罪标准，因此诸如帮信罪涉案人员在电信网络犯罪中的功能分析、本罪名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罪名的区分适用、主观认定的审查标准等问题，始终是基层检察办案实践关注的重点难点，需要积极适应犯罪治理新形势，准确把握严与宽的辩证关系。

“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前提是强化审查认定的准确性。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与公安、法院的协调合作机制，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在本辖区的发案特点，及时研判在侦、诉、审环节的共性问题，形成打击犯罪的共识和合力。立足“破大案、打团伙、断链条、断通路”的办案思路，重点关注对黑灰产业链的整体打击，要准确识别网络犯罪涉及的不同环节及分工，避免司法适用“碎片化”的倾向。对帮信罪的认定应当严格区分具体行为类型，注意处理与相关犯罪的共犯和正犯之间的界限和竞合关系，不能仅仅以行为人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支付结算帮助为由，而片面地否定共犯存在。

刑事司法始终应当保持理性，不能为追求威慑效果而“一刀切”地进行“顶格”处罚，“通过司法限缩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形势下的立法扩张带来的问题”也因此被认为是当前刑事司法实践的关键策略。近期“两高一部”也明确，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参与两卡犯罪或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形，在查明涉案人员是否“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避免简单客观归罪。在审查中发现行为已经涉嫌事前共谋、共同经营、参与分成或受雇为公司成员等程度，应当及时引导侦查机关深挖相关线索，明确涉案人员在网络犯罪行为中的参与程度，准确认定，当“严”则“严”。

4.2 优化办案模式，慎用羁押强制措施

从办案质效角度，帮信罪所涉及大量证据的数字化特征对其收集和采信产生了全新的影响。推进此类轻罪案件的“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通过类型化办理促进检察办案专业、简快、质效的有机统一，助推审前轻微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和以检察机关主导责任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对轻罪治理的成效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除了在刑事流程上，如何恰如其分地适用强制措施也应当予以关注。学者张明楷曾不止一次强调，“警惕将价值判断误解为逻辑结果”[6]。监禁羁押的多寡未必直接与犯罪打击成效相关，例如有研究表明，罚金对侵财类犯罪反而可能起到更好的预防再犯效果。“监禁刑并非导致人们犯罪的开端，而可能是对犯罪人越来越糟糕的一种处境的确认”[7]，考虑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典型的轻刑犯罪，且多数涉案人员并不具有直接危害社会的主观心理，检察机关通过积极运用不起诉决定，以及在量刑中主动建议缓刑适用，有助于实现“恢复性司法”的治理效果，激发被告人自我约束的主动性，避免陷入“犯罪循环”的困境，同时也节约了刑事司法的成本。

促进轻罪治理，完善办案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检察机关需要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保障起诉裁量权运行的规范和稳定，确保“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得以有效运行。通过强化羁押风险“动态评估”，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作用大小、社会危害程度、人身危险性，结合其认罪认罚态度和悔罪表现进行司法决策，在使用强制措施和量刑建议时，比对一般涉案人员和跨境网络犯罪的集团人员、贩售“两卡”的职业团伙及骨干之间，应体现差异化程度。例如，对前文所提到的超过九成的具有偶犯、初犯等情节，处于犯罪网络的末梢人员的“卡农”等低龄无业人员，符合条件的应及时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并同步开展法治教育和价值引导等。

“司法越公开就越有公信”，应勇检察长在重庆调研时指出，要不断健全公开听证、人民听证员、检察机关内部审核把关等制约监督机制，特别是不捕、不诉等权力关涉当事人合法权益、关涉司法公平正义，必须“加

把锁”。帮信罪是典型的“法定犯”，恰好可以发挥检察听证在强化民众价值厘定和规范认知方面的优势。对因相应理由不捕不诉的，积极鼓励落实组织听证。同时，要高度重视建立健全轻罪案件矛盾化解机制，实质性解决矛盾纠纷，实现轻罪办理“三个效果”的深度融合。

4.3 依托大数据手段，推进参与社会共治共建

基于网络时代社会财产和人际关系的新型复杂架构，准确认定涉案人员所起作用 and 地位层级是确保罪责罚相适应的关键。尤其是对于轻刑犯罪而言，既要使潜在犯罪者感受到刑法的威力，又要避免“一诉了之”，增加社会司法负担。

因此，一方面针对基于社会衡量综合效果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需要坚持全程履职，实现不起诉效果的最优化，结合检察建议、释法说理、行刑反向衔接等多种形式，有效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内生稳定。检察机关应基于“行刑个别化”理论，不断完善对不起诉案件的后续管理监督机制，正确对待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诉讼办案“一体两面”的职能定位。继续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反向衔接机制。与主管行政机关加强交流，研究不起诉非刑事处罚的方式、幅度等问题，共同研究解决不起诉案件行刑衔接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形成更大范围的执法司法合力。

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刑事追诉、不起诉和行政处罚、经济处罚、社会管理等方式，依法妥善处理。有效开展刑罚执行监督，关注缓刑适用，破解将实体刑判罚作为打击和惩治犯罪的“唯一方案”的“惯性”，以“智慧检察”为发力点，依托“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系统”“数字羁押码”以及通讯定位等方式，对被告人在社会情境中有效进行监管和矫治，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对预防再犯起到实时预警和动态管控效果。结合办案与人员各类信息在“大数据场景”中的碰撞对比，进行线索摸排和风险梳理，向相关行政、司法部门提供对策建议，深化办案成效。正所谓“办好一个案件胜过一打文件”，要应形势变化，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注重典型案例的发现、提炼，展示履职成效，并联合司法、行政机关，采取以案交流、重点案件专项办理的方式，全面提升案件质量、提升监督质效。通过检校合作等形式，加强行刑衔接前沿理论研究，推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良性互促，不断深化检察监督。

基金项目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2024 年度省级检察理论研究课题：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与检察应对——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GDJC2024050C）

参考文献

- [1] 卢建平, 王昕宇. 十八大以来犯罪形势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考察——基于司法统计数据的分析[J]. 犯罪研究, 2023(1): 32-51.
- [2] 薛应军. 最高检: 五年来我国刑事犯罪出现四大变化[N].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3-02-17(001).
- [3] 陈兴良. 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3(3): 3-18.
- [4] 林劲松. 日、德、中三国适用起诉便宜原则之比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6): 37-46.
- [5] 张明楷.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J]. 政治与法律, 2016(2): 2-16.
- [6] 张明楷. 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以点的理论为中心[J]. 法学研究, 2010, 32(5): 128-145.
- [7] 王崇. 罪刑克制程序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20.